

生命的惩戒、治理与生存的美学

——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支运波, 刘莉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 奥威尔运用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阐释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小说《一九八四》, 借此展现了大众生命在遭受否定性权力惩戒后, 被权力的单边主义真理推向极端, 直接裸露在权力之下, 最后沦为纯粹“赤裸生命”的情状, 集中显现了权力彻底政治化时未来社会的生命政治学和社会伦理范式。以生命抵抗政治的生存美学, 传达了个人如何在政治与技术的双重生命场域中“复活”并生存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 奥威尔; 《一九八四》; 生命政治; 生存美学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6-0200-06

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虚构一个充满监听技术的大洋国所提供的警示性而享誉世界。对极权主义的政治恐怖情结与令人窒息的绝望生存状况形塑了人们对《一九八四》的接受印象。然而,《一九八四》给予世人的启示以及让世人时刻铭记的原因显然并不仅限于这种单一面向。因为,它既需要从当前全球政治治理新范式的时代语境去认识大众的生存境遇,也特别需要我们反思小说描绘的由政治权力以及科学技术渗透群体生命的社会伦理。按照福柯的理论,即是说,《一九八四》预言了未来社会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

一、《一九八四》与生命政治的关联

《一九八四》与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关联性在于大洋国政治权力直接以温斯顿等人的生命(以身体为核心)作为直接治理对象,利用电幕、医学技术等统治技术对人们实施惩戒威慑下的驯服管治,大洋国人民的生命(以英社党党员的日常生活为核心)是由权力和技术塑造的非自然的生命。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生命政治学是福柯十余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讲授中所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从《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

(1970)首创生命政治概念始,其间经历了《必须保卫社会》(1975)、《安全、领土和人口》(1977)、《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直至《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讲真话的勇气》(1984)收尾。福柯阐述了其从西方社会变迁史中所发现的权力直接作用于生命对象的重大翻转。这主要表现为西方自近代以来有关国家治理方式从以“规训”(les disciplines)为特征的“身体的解剖政治”向以“类别的人”(l'homme espèce)的调控为核心的“人口的生命政治”的历史性过渡。国家治理的旨趣从治理的多一点转向治理的松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身体解剖政治学”的销声匿迹,而是和“人口的生命政治”一起共同构成了权力在生命上的现代展开机制:作为一种装置的布展逻辑。相对于生命的其他要素,福柯认为没有比权力再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了。于是,他便从权力以生命作为直接实施对象的理路出发,探求生命进入权力的政治技术领域后,权力与知识所可能呈现的样态与机制。

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的权力形式“不是个人化,而是大众化”^[1]的干预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在两个方面发挥着自身的干预作用:一是人类自身的整体性问题,二是人类的外部联系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实施着内部整体性管治并处理其与外部的关系。福柯将此种权力机制上溯到牧羊人对羊群的看管上,并主观地设置了牧师与羊群之间的单边关系:牧师对羊群的主

收稿日期:2015-07-23; 修回日期:2015-1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审美趣味变迁与文化权力演变关联性研究”(14CZX062);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海德格尔后期诗学研究:以 Ereignis 为进路”(JUSRP11472)

作者简介:支运波(1980-),男,安徽怀远人,文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与美学;刘莉(1969-),女,辽宁大连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导权。尽管福柯赋予牧羊人“引领羊群”和“照料羊群”的集体拯救责任,但其将子民等同于动物和取消“领羊”中介的隐喻,更凸显了看护与救赎面纱下隐藏着暴力利刃和生命的危险时刻。羊群与牧羊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权力鸿沟和天然的种属差别,牧羊人的皮鞭既调节着羊群的内部秩序,也规范着羊群的外部环境。在羊群内部,羊群是无主体性的沉默群体;在羊群外部,一旦离群或行为与群体出现不一致时,暴力与死亡就可能随时直接降临。而当两者处于紧张状态时,牧羊人的皮鞭便以暴力的面目直接与以羊群的身体为最后防线的生命相遇。以此观之,当人民直接面对权力时,他们的生命就将沦为国家权力下的“既不活,也不死”^{[1](184)}的模糊性存在。

《一九八四》虚构的正是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极权统治的荒唐与恐怖,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提供了警示和值得沉思的绝佳例证。小说分三部分分别叙述了“大洋国”外围党员温斯顿所遭受的身体监控、思想征服和人性消除的政治权力管治,以及他反抗无望终而屈服的生命境遇。奥威尔并未设置太多的人物,更没有复杂的故事以及曲折的情节。小说中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在大洋国中对电幕监控、思想控制以及婚姻爱情的老大哥的政治渗透的抗争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但作者并非有意塑造温斯顿这么一个没有多少趣味的人物,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缩影借此呈现大众日常生活所遭遇的权力语境。温斯顿难以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他的行动受到监视、言说受到监听,不断参加老大哥组织的游行活动还时刻担心被告密。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婚姻无爱,无处寄托。他又不得不接受由权力所塑造的现实和书写的文化历史。《一九八四》描述的未来社会中权力的否定性维度,它与福柯宣扬的积极的权力理论恰好是生命政治理论所涵盖的两个维度。

二、生命的惩戒技术

努力将审美与政治艺术性地统一起来,无疑是奥威尔一再强调的“写作动机”^[2]。作为一部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经典之作的政治小说,评论界需要从由“政治恐怖性”^[3]生成的既定阐释史和刻板印象中挪移开来。因为,一方面,《一九八四》的政治书写已使“旧的政治理论”不再奏效^[4];另一方面,极权主义国家——正如海德格尔的弟子,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所发现的那样——最基本的特征是“生命的政治化”,而非其他。因此,从生命政治角

度阐释《一九八四》才能切近小说的深刻内涵。而且,即使是中性或私人化的生命领域,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是一个权力化的领域了。何况,福柯的研究已经表明至少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仍然还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的动物。在当前国际政治理论新范式中,相较于极权主义,“生命政治这个问题愈益走向前台,并且成为中心”^[5]。福柯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应当关注生命政治的死亡维度(权力的否定性)。

《一九八四》是写未来的预言小说。它的未来性在于给人们描述了一个可能出现的生命政治场景:即失去了一切屏障之后的裸露的纯粹生命状态。小说第一部分写外围党员温斯顿深受“老大哥”全面监控的生存状态,接着写温斯顿与裘丽娅的恋爱过程及其遭受的政治煎熬,最后叙述温斯顿被捕后在权力以暴力的面目作用于身体后如何屈服的过程。奥威尔借助权力惩戒与反抗无望的此消彼长关系告诉人们:在一个生命政治环境中,身体、爱情与人性所遭受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权力的残酷,而主要在于如何摆脱动物性的存在状态而使人成为人。“老大哥”,既没有身体,甚至也没有具体的存在形式,更从未真正实现身过。“老大哥”也不像古代君主的身体那样成为权力展开的中心,但人们却能真实地感受到他的存在。这种书写策略意味着他是一个符号、象征,代表随处现身的政治体制、权力机制。他依靠国家机构(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富裕部)、党员、电子技术(电幕)以及一系列活动(如:仇恨周、标语、口号)来发挥政治作用,这体现了以管制和调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权力体制取代了古代以“剑”为象征的专制主义。在暴力性上,毫无疑问是大大地减弱了,但它却更加广泛地渗透进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奥威尔让老大哥物质身体隐形却复活了其作为符号象征的全能监控性,实际上是权力更加强化了。

温斯顿生活的大洋国,到处布满了老大哥的政治组织与科技构筑。各种核心党员、外围党员、监视者,甚至青少年儿童都被老大哥利用,成为他的眼线,向他汇报可能发生的违反情况;到处安装的电子屏幕,四下藏匿的麦克风,时刻巡逻的直升机,竭其所能地监听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以防止任何反抗行为的发生。工作场所、私人空间、公共环境等,无一不在政治的严密监控之下。而且,这种监控不是以人力而是以科技的方式进行的。毛细血管式地渗透进人们的身体,并根据渗透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身体特征。如果有人胆敢试图违反老大哥所预设的正常行为,英社党就会以外科医生的方式“把人变样,再也认不出来”^[6]。就如意大利著名学者奈格里所认为的,规训

的权力构成了“建构思想和行为的参数与极限……行使权力的机器直接组织人的大脑(通过通讯交往系统、信息网络等)和人的身体(通过社会福利系统、活动监控系统等)”^[7]。小说中遍布的电幕已经展露出对德勒兹意义上的现代控制社会中生命政治治理技艺的前瞻性描述,预测到了极权主义向控制社会的过渡中,权力在禁锢之外,更加注重信息运作来实现持续控制的转变。

大洋国对民众的思想征服是通过新话(New word)和“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进行的。老大哥不断声称与东亚国发生战争(后来还可随意更换对外战争国对象)以捕获民众情绪,从而达成利用和有效管制的目的;在内部则通过“真理部”(小说中与记录司)这个国家机构制造“新话”和“双重思想”,进而利用话语霸权制造出适合统治的话语规则、思维方式和知识系统。罗兰·巴特说权力寄寓于语言,真理部不遗余力地篡改文书、训练双重思想、发明新话,正好印证了这个论断。英社党以“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6](32)}作为党的口号也就不难理解了。文字记录一旦被改写,历史存在就将遭受危机。大洋国的历史与知识,是权力书写的话语,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国民的自由表达,“而是一种规训力量,使那些不被认可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8]。新话取代主体话语是将人们驱赶到福柯生命政治分析域中羊群的地位——作为一个哑口无言与无主体的动物性的生命存在。在福柯分析的断裂之间为权力拓展、预留的空间:“让其活”和“令其死”的在场。在这种语境中,个体因群体而存活,群体的所有价值全在于为权力引导而存在,个体自身的一切价值与其说模糊不清,不如说荡然无存。因为,读者和温斯顿一样都不知道暴力何时降临,但所有人都明白暴力从来没有离开,它随时都可以现身。

英社党采取的第三个“规训技术”是人性的消除。温斯顿不仅丧失了身体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英社党的政治权力规训更是一步步吞噬掉他的人性,使其不断沦为“非人”状态。在小说的开端,温斯顿写下了电影院的见闻,观众们满心欢喜地欣赏银幕上满载难民的救生艇在海中遭受直升机狂轰滥炸时的心理:情感麻木、无视生命、缺乏关怀。即使是隐秘的性和性行为也难逃权力的渗透。温斯顿的身体一接触到妻子凯瑟琳,她就浑身紧张,像一具泥塑木雕一样毫无感觉。权力是冷冰冰的怪物,它使夫妻间的性生活成了“对党尽义务”^{[6](59)}。婚姻的唯一合法目的转变为国家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关注的再生产的动力。英社党对孩子们进行反对以愉悦为目的的性爱教

育,鼓励他们成立“少年反性同盟”,要求人们以人工授精的方式繁衍后代。裘丽娅说这是因为老大哥害怕性可能带来的反抗行为,可从国家治理层面上看,英社党更加关注的反而是调节其生产属性。技术进入人的身体并和性结合从而实现对人口的调节和再生产。英社党反对同事友情,反对夫妻爱情,更反对家庭亲情。在英社党的思想灌输下,孩子会随时告发自己父母的反党言论。英社党反对一切形式的关爱与亲情,却极力宣扬“仇恨”,或以身体惩戒来实现个体对人性的中断。生命在于人性和感情,而生命政治治理技术恰恰是清除这些标志着人的属性的东西。奥威尔寄希望于无产者“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蛰伏的力量”^{[6](149)}以缔造一种无权力铭刻的自然生命状态,反过来说明了大洋国对人民生产惩戒技术的严酷。

三、生命的权力治理机制

英社党在实施秘密组织、技术监视和语言控制等一系列惩戒技术之后,更加直接地让权力走向前台,同时加速权力的运转机制。这突出地表现为老大哥在两个方面把温斯顿的生命推向极端。一是大洋国“权力即上帝”^{[6](253)}的权力单边主义真理,即主张权力的逻各斯;一是“大洋国内没有法律”^{[6](189)},这就把没有保障的民众生命推向纯粹生命的赤裸境地。权力的单边主义真理是将人类——这一理性主义的生物置于无理性、无思维、无情感的断裂境地,以单方面力量改写历史、知识、现实和既定法则以重新塑造符合权力统治的新规则。大洋国的三条禁律: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党通过改写记录和人的思想从而改变文字记录和人类记忆以书写自身的历史;二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毫无怀疑地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第三是以“新话”为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三条禁律完全是靠权力保证的,没有制约的权力此刻具有终极的意义。即使是“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数学真理都不再存在。奥威尔是要说明世间的一切都是政治的。这种权力的单边性带来的后果是将它的反面都推向纯粹极端的时刻,对大洋国的子民来说,就是其生命失去了保护性屏障——直接裸露在权力之下,成为意大利生命政治理论家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

“赤裸生命”是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理论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阿甘本认为“赤裸生命既不是政治的生活方式(bios),亦不是自然的生命方式(zoe),而是自然生命与生活方式在对彼此的吸纳和排斥中互相构成的

模糊地带”^[9], 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无差别和连续过渡区域”^{[9](109)}的形式上的生命(form of life)。通常, 它是由政治上的排除和暴力的滥用捕获生命后所生成的。温斯顿作为真理部工作的英社党党员, 按常理奥威尔应该赋予他以掌权者基本的权力。可作者故意让他以不充分的理由被逮捕, 在投进监狱后奥勃良便像处置动物一样对待他。温斯顿在被剥离掉政治身份后, 其生命便立刻暴露在死亡暴力下。在监狱里, 温斯顿被施以电刑、鼠咬, 注射药物, 温斯顿失去了一切权利, 他以一个赤裸裸的生命形式存在, 就是这个最后的赤裸生命却也是老大哥政治暴力最感兴趣的目标, 是生物生命和政治生命被毁坏后仅剩的残余物。

在“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的英社党的口号下, 老大哥借助通讯组织或电子装置捕获以温斯顿为代表的大众的生命, 以呈现生命政治构建自身领地的方式和它的生产性: 新的权力主体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肉体 and 灵魂的生产。这就像奈格里所说的, 生命政治的本质在于“生命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行使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 它追随社会生活, 解释它、吸纳它, 并把它重新表述。……权力……指导、管理生活”^{[7](29)}。老大哥用“生命权力”组织党员和工人阶级的生命, 组织管理民众“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旗帜、标语、电影、蜡像、敲鼓、吹号……”^{[6](164)}。可一旦有人试图逃离英社党的管治, 就会立刻被逮捕, 同时失去法律和政治的保护。温斯顿就是被这样投进监狱遭受电刑, 直到他放弃自己的情感, 爱上“老大哥”。

“和平即战争, 战争即和平”, 奥威尔使用这样封闭式语言使“矛盾在句子中不是被澄清, 而是被封闭在名词之中”^[10]。“二加二等于五”“和平即战争, 战争即和平”等等, 这些奥威尔式的封闭语言本来是非正常状态, 但在奥威尔预言的新世界的新话中, 它却是合乎法则的常态。在一个人的思想中, 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 这种非正常的能力却成了英社党自觉的核心思想; 温斯顿既没违法, 也没做过任何错事, 却因为思想犯罪这种有悖于法理的荒唐罪名被投进了监狱。这一系列不合规则的特殊情况, 对于被压迫者而言, 根本不是“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 而是常规”^[11], 是没有屏障的生命所必然遭遇的常规。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 他们“不仅确认规则, 而且规则存在于单独的例外之外”^[12]。这很好地体现了施密特所说的国家权威的本质。当代著名生命政治理论家阿甘本称其为生命政治的典范形式。温斯顿从来不是一个单个的人, 而是代表着那些活在常态与例外的双重张力中的没有法

律屏障保护、没有权利、无所谓尊严的卑贱者。英社党的政治没有例外性, 安全的生活比暴力事件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给人造成的恐惧更强烈, 日常生活中的温斯顿时刻担忧老大哥的出现, 而这种恐惧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奥勃良发现他把他投进监狱的那一刻。他无法断定周围的环境和身边的人, 哪里安装了监视装置, 谁是告密者。生命的赤裸时刻随时都会降临,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示众的献祭者。例外的威慑在这里起到了两个关键作用, 一是将“生物生命”(natural life)带入眼前, 二是使现实生命实质上成为形式生命。借此, 迫使生命重新被权力改写和接纳知识新秩序, 从而完成权力驯服生命的主导功能。

在生命政治学理论看来, 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是权力彻底生命政治化的集中表现, “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 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个神经末梢, ……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 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 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7](30-31)}那么, 抵抗生命政治机制的希望何在呢? 奥威尔认为它存在于那些没有被权力铭刻的无产者身上。奥威尔借温斯顿之口说: “如果说还有希望的话, 那么希望一定是在普洛身上……到处都站立着同样结实、不可征服的人物, 因劳动和生儿育女而体态粗壮, 终生劳苦但仍在歌唱。从这些强壮的腰胯下, 一个有觉悟的种族终究有一天会诞生出来。你已经死了; 未来是他们的, 但是你如果使你的心灵生存下去, 你还是能够分享到未来的。”^{[6](227)}这些“普洛”的觉醒意识, 已埋藏在温斯顿的内心, 它是温斯顿在恐怖的大洋国中继续生存的明灯。

四、生命抵抗政治的美学

英社党统治的大洋国, 是一个没有行动自主、思想自由、情感尊严和家庭内部友爱的政治恐怖社会。《一九八四》里面的人物最后必然都会走向背叛, 没有一个存在自性的人了。自然生命彻底被权力生命所战胜。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既为福柯所论述的积极意义上的权力观和人口调节功能的生命政治阐释提出了难题, 又暗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悲观生存论。

其实, 奥威尔并非要在《一九八四》中刻意渲染恐惧心理和紧急状态的压抑, 宣扬末世绝望论调, 相反, 他在作品中充满了同情、人道、善良和“最伟大的道德力量”。^[13]对于《一九八四》的极权主义, 奥威尔自称其真正想表达的是它对思想自由空间的“积

极方面”。^[14]在物质性上,大洋国权力政治并不是否定性的消灭,而是要通过塑造“温顺的身体”^[15]生产出顺应权力运作的强壮、勤奋和安全的“顺民”;在精神上,以消除异己的面貌的权力,则是希望从精神上催生新质,让大众的头脑中生产出“爱”(尽管是对权力的依顺)。于是,我们看到的是颇具田园牧歌色彩的治理技术。大洋国“真、和、爱、富”四部就算是以虚假的美好为名义,但与古代君主专制主义的权力相比也的确存在一定的积极性。虽然,到处装有电幕,可这些电幕既不可能监控每个人的隐私,也不能起到强化统治的目的,因为不能保证电幕后真的有人在监视,或时刻在监视,而且人们都清楚如何躲避它的监视。奥威尔可能认为电幕只是一个摆设。温斯顿是因为墙上画背后安装的电幕被捕的,这与其说是电幕的作用,还不如说是作者所怀有的人逃离不了政治的隐喻。或者,更乐观地认为它还具有放送功能,特别是要求人们在电幕前保持安详、愉快的表情。老大哥也不是以憎恨而是以爱为目的。英社党虽然鼓吹以生育为目的的结婚行为,反对任何形式的欢愉情感,可温斯顿却还是能和裘丽娅自由地私会。奥威尔认为无产者没有文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可他还是把希望寄托于无产者身上。对此,挪用齐泽克的精辟见解解说奥威尔书写的大洋国,也是非常恰当的,齐泽克说:“我们生活在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又都没有可能的世界。”^[17]《一九八四》的意义就在于“不可能”的极权主义下的可能性,或者像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歌所说是希望濒临危险之旁。

身体是生命政治实施的场所与核心,它“是两面性的存在物,既负载着对最高权力的屈从,又负载着个体的自由”^[18]。在温斯顿以梦境的方式,由自然和异性身体美唤起,以性欲的不同满足方式和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抵抗英社党的生命政治之外,奥威尔也提供了几种从身体角度对抗极权统治的生存策略:“首先,温斯顿拒绝顺从生命日常不安的反抗身体,其次,裘丽娅在性爱中的裸露身体,最后是无产者母亲在日常工作中歌唱的强有力的身体。”^[19]温斯顿一再怀念无所忧虑的童年,重现记忆中的母爱,对楼下粗壮女子“感到一种神秘的崇敬”,他所尝试的抵抗,奥威尔所能提出的也只是借助内在性的糟糕情绪和随意的性关系方式。其结果也只会可能带来像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某种刻意的堕落和冷漠”^[20],或者被权力机器所驯服,最终失去了自然的生命。

温斯顿的失忆(或痴呆)更像是“自由主义的神志清醒”(liberal sanity)。^[21]奥勃朗“让”温斯特“想到了自己”,尽管是通过诱捕与惩戒的权力方式实现的,

可是,温斯顿具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自我抉择、自我反应等这些自主主体的形式。生命政治统治技术之下缔造了温斯顿独立思考的人类存在方式,这是奥威尔《一九八四》对于生命政治治理技术中给生存美学打开的一个缺口,也是对福柯提出却未能完成的难题的一个补充。温斯顿的生命过程说明了,在极权统治下,人类被召唤成“高贵而美丽的独立客体”^[22]。奥勃朗能够让温斯顿得到它想要的结果,可他却无法使温斯特爱上这种结果。因此,“在个体内仍然残余一丝超越老大哥控制的独立性”。^{[21](103)}或者,在另一方面,奥威尔迫使温斯顿丧失人性,在奥勃朗的政治洗脑并佐以医学技术的保证下恢复健康和精神,恐怕是要引发人们反思如何在政治与技术的双重现实中生存的美学问题。因为,政治暴力可以规训惩戒人的物质性身体和行为方式,也能生成不一样的知识系统,甚至制造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环境,但是老大哥却不能让温斯顿心甘情愿地屈服。然而,医学和科学技术则可以弥补政治的这个不足,就像奥勃朗说的,它可以使人变样,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来。监狱里的电刑就使温斯顿彻底完成了这种转变。在前者,奥威尔提供的生存美学是一种分裂主体的行为,单纯以意识和想象这种人格分裂的方式进行抵抗;在后者,奥威尔无能为力,温斯顿爱上老大哥,欧洲最后一个人消失了,温斯顿寄希望于无产者以及大洋国新话都显得异常苍白。

五、结语

《一九八四》本来的名字为《最后一个人类》,可见,奥威尔的初衷是忧虑人类的自然生命,他担心没有权力渗透的生命将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说,《一九八四》是一部有关生命治理的现实主义小说。人们或许说《一九八四》虽然并不一定出现,但它给我们描述的生命政治场景从来就一直伴随着每一个人。而如何在生命政治治理新技艺中产生出美来,是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主导范式中的每一个人所无法回避的尖锐而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

参考文献:

- [1] 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86.
- [2] 乔治·奥威尔. 我为什么写作[M]. 刘沁秋, 赵勇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46.

- [3] 伯特兰·罗素. 罗素回忆录: 来自记忆里的肖像[M]. 吴凯琳译.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6: 170.
- [4] 理查德·罗蒂. 偶然, 团结, 反讽[M]. 徐文瑞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43.
- [5]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极权主义还是生命政治? ——关于 20 世纪的哲学阐释[J]. 刘耀辉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0(3): 68-73.
- [6]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M]. 董乐山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57.
- [7] 哈特·奈格里. 帝国[M]. 杨建国, 范一亭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29.
- [8] Roy Harri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New speak [C]// Harold Bloom. Modern Critical Views: George Orwell.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114.
- [9]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M]. 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90.
- [10]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81.
- [11] 吉奥乔·阿冈本. 例外状态·导论[M]. 薛熙平译. 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 2010: 9.
- [12] 吉奥乔·阿甘本. 剩余的时间[M]. 钱立卿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11: 130.
- [13] Dennis Poupar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M]. Del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5: 339.
- [14] George Orwell.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C]. New York: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1968(4): 460.
- [15] Geoff Danaher, Tony Schirato, Jen Webb. Understanding Foucault [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66.
- [16] Žižek, Slavoj. A permanent economic emergency [J]. New Left Review, 2010(64): 93.
- [17] 吉奥乔·阿甘本. 生命的政治化[M]. 严泽胜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22.
- [18] Naomi Jacobs. Dissent, Assent, and the Body in Nineteen Eighty-Four [J]. Utopian Studies, 2007(18): 3-20.
- [19]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Fontana Modern Masters Series, Glasgow, Collins [M]. 2nd edition. Glasgow, Collins, Flamingo Paperback Editions, Glasgow, Collins, 1984: 81.
- [20] Craig L. Carr. Orwell, Politics, and Power [M].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0: 89.
- [21] Mill J S. 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M]. New York: E P Dutton. Mill, 1951: 161.

Punishing and governing life and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Reading Orwell's *Nineteen Eight-Four*

ZHI Yunbo, LIU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iopolitique which was initiated by Foucault, the present essay clearly illustrates the bio-political nature disclosed in the totalitarian novel *Nineteen Eight-Four* by Orwell. Employing Big Brother as a symbol of power, Oceania, a country ruled by Ing. Soc, imposed a series of physical punishments and life governance techniques on Winston Smith, who was an outer party member. In the novel, Orwell reveals to us how the individual life could be reduced to bare life after suffering the polit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rpenetration, and meanwhile he also expresses his deep concern for human life as well as his hope and pursuit for existence of aesthetics in the life field.

Key Words: Orwell; *Nineteen Eight-Four*; biopolitics;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编辑: 胡兴华]